

1920年代德國支持安樂死的論述： 以《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 其範圍與方式》為中心之分析

伍碧雯*

「安樂死」一詞自古希臘時代出現，至十六世紀初期之前，均指和緩、舒適、美麗的理想死亡狀態，並無外力介入之意，更無積極或消極死亡之說。直至近代學者重新詮釋安樂死，以「解放悲慘生命」的動態想法，取代靜態的原意。安樂死的內涵不僅產生了質變，而且與歐洲基督教「自然死亡」的觀點，大相逕庭，在此已呈現出傳統思想與新科學觀念之對立與衝突。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有關安樂死的討論，已漸成為歐洲與美國學界的課題。本文以德國1920年代——威瑪共和的核心時期，支持安樂死的重要論述《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為主要分析對象。1920年代從時代特殊性而言，這是德國從集權驟變為民主共和的新時代。民主政體與精神，為敏感的生命終結問題，塑造了開放、自由的議論空間。數年間，出現了許多顛覆傳統死亡觀的論述文章。而且一次大戰後，德國學、政界憂心，青、壯人口嚴重折損，人口品質有下降之危，可能導致社會重建無力、國家生產力不足。在討論人口品質的相關議題中，最負面、最極

*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聯絡地址：23741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No.151, Daxue Rd., Sanxia Dist., New Taipei City 23741, Taiwan (R.O.C.))

端的安樂死，因而成為選項，這也是國家經濟問題與社會困境的可能解決之道。本文以《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之論點為出發點，分析支持安樂死的論述中，包含哪些重點？具有哪些特殊性？這些論述如何建構支持安樂死的合理、合法性？雖然直到威瑪共和結束，德國政府始終沒有開放安實行樂死，但是當時的論述模式與思考重點，迄今仍然有參考價值。

關鍵詞：安樂死、德國威瑪共和時期、德國1920年代、賓丁、霍賀、《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

一、前言——1920年代德國的民主討論環境

生與死均為人生大事，前者為生命之開啟，後者為生命之結束，二者分別位在生命歷程的兩個端點，整體過程縱然千變萬化，然而人人難逃一死。死亡是人生歷程的最後步履，毫無逆轉之餘地，跨入後即全然終止結束。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善終？如何優雅、舒服、無痛苦、有尊嚴的「好死」？實為死亡過程的難題。美國醫學者努蘭(Sherwin B. Nuland)在其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的著作《死亡的臉》(*How We Die: Reflections on Life's Final Chapter*)中表示，人應該有權決定離世的方式，「死亡屬於瀕死者和那些愛他的人們」¹書末他引用詩句：「而應以不變的信念，堅毅而寬心地邁向墳墓。……躺下來，做個好夢。」²努蘭所推崇與期望的理想死亡過程，充滿了溫暖、浪漫、無懼，當然更無痛苦。

從實質處理面而言，現代醫師面臨病患瀕死狀態時，大多有理性的處置規範可依據。以2004年德國的「聯邦醫師協會關於醫療上陪伴死亡之原則」(*Grundsätze der Bundesärztekammer zur ärztlichen Sterbebegleitung*)為例，將「尊重病患生命的自我決定權，維護其健康，減輕其痛苦，以及陪伴瀕死者至死」等，列為基本重點，此外也提到：有一些病情，若經由適當的診斷與治療過程，仍然無效，則可以進入「緩和醫療照顧」(*die palliativ-medizinische Versorgung*)。³但是針對此項要點，更特別說明：「這個決定，絕對不可受到經濟考量的牽制」，換言之，以「浪費醫療資源」、「節省醫療成本」……等等衡量經濟能力相關的思維方式，都應摒除於陪伴瀕死者，以及處置死亡的过程。⁴

¹ Sherwin B. Nuland, *How We Die: Reflections on Life's Final Chapter*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4). 中譯本：許爾文·努蘭著，楊慕華譯，《死亡的臉》(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9)，頁332、334。

² 許爾文·努蘭著，《死亡的臉》，頁338。

³ 本文件引自Udo Benzenhöfer,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9), 206.

⁴ Udo Benzenhöfer,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206. 比較1979年德國的「聯邦醫師協會對於協助死亡之準則」(*Richtlinien Bundesärztekammer*

無論是感性的陳述理想死亡方式，或是理性規範陪伴死亡過程，都呈現出西方學術界以異於傳統基督教的觀點，思索與詮釋死亡。在眾多與死亡相關的課題中，「安樂死」(Euthanasie)是最極端，也最具爭議的課題。因為「安樂死」不僅只用於形容理想的死亡方式，也是終結生命的實踐行動。因此，誰可以決定生命結束，並規範結束的形式、過程與步驟？誰握有終結生命的合法、合理解釋權？更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安樂死屬於他殺、自殺或是協助殺人？……等等眾多迄今二十一世紀，仍在宗教、法律、倫理、醫學、人性等各層面，各自據理力爭、各自表述的紛亂狀態。各方在安樂死議題上，難以產生共識與難以妥協的根本原因，即在於前述：死亡為生命的「最後步履」、「無可逆轉性」與「全然終止」之總合狀態與結果。

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有關安樂死的討論逐漸成為歐洲與美國學界的課題。⁵本文選擇德國 1920 年代為探討時代，主要著眼於這段時期為德國威瑪共和(1918-1933)的核心時期。德國所面對的政治體制變動、現實經濟景況，緊密牽動著學術界對於安樂死的思考模式，甚至迫使學界從務實的角度，思考死亡議題：

首先，相較於西方民主國家，德國至 1918 年底才脫離傳統帝制，驟變為民主共和制。突然出現的嶄新政治體制與時代精神，導引了學界與社會進入開放、自由的討論環境。間接為探討敏感的死亡問題，塑造了絕佳的開放議論空間。許多安樂死的支持者，秉持著經濟工業化、生活現代化的新時代、新環境，應以新思維、新理念、新的解決方案為思考出發點，在十九世紀末已出現的安樂死論述之上，繼續闡揚觀點，添加支持立場的柴火，猛燒此課題。當時投入安樂死討論的學者，主要來自法律、醫學、神學、倫理學等領域。各自依其學術或宗教信仰立場與信念，提出意見。數年之間即出現相當多的論述。有學者認為，雖然威瑪共和時期的討論，最終並未促成政府決定開放安樂死，但是當時的論述模式與思考重點，迄今

für die Sterbehilfe)，以及 1993 年「聯邦醫師協會對於醫療上陪伴死亡之準則」(Richtlinien der Bundesärztekammer für die ärztliche Sterbebegleitung)兩者的內容，均無特別註明禁止以經濟因素考量的敘述。可參閱：Udo Benzenhöfer,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201-206.

⁵ Udo Benzenhöfer,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chap. IX.

仍然極具參考價值。⁶

其次，德國剛經歷 1914 年至 1918 年的大戰，士兵死傷人數最多。戰後學界與政界憂心，國內青、壯人口嚴重折損，人口品質有下降之危，進而可能導致社會重建無力、國家生產力不足、國際競爭力落後，甚至民族退化等後續長期的影響。戰後政府又面對未可知的賠款與財、經困境。而這些只有德國才面對的特殊狀況，促使「經濟效益決定生存價值」的思考模式，日益增加合理性與正當性。這也反映在討論如何提升人口品質的相關議題中。其中最負面、最極端的安樂死，因而成為選項。⁷因此威瑪共和時期支持安樂死之論述動機，不單純是為了個人尋求「好死」的死亡方式討論，也是尋求國家困窘經濟與社會貧困等問題的解決之道。

第三、1933 年納粹政權開始，安樂死的討論者在前面民主時代享受的多元開放議論環境，立即終止。極權時代乃由國家全面主導言論與思想內容，安樂死議題的正、反爭議已無須存在，由政治高層單方面決定積極、秘密的實踐。威瑪共和時期支持安樂死的相關論述，是否直接導致了 1940 年代納粹在國內進行強制性集體安樂死，以及預備了之後滅絕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行為？納粹的暴行與威瑪共和時期的論述，有無直接關連？德國歷史學者至今仍有爭議。⁸甚至納粹時期的秘密安樂死行動，是否

⁶ Michael Schwartz, „Euthanasie“-Debatten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6 Jg. (1998), 665.

⁷ 伍碧雯，〈納粹政權對於「無生存價值」德國人的處置〉，《成大西洋史集刊》，第10期(臺南，2002)，頁292-293。

⁸ 有關納粹政權對德國國內特定人士進行強制且集體的安樂死，以及對猶太人大屠殺等暴行，是否與威瑪共和時期支持安樂死的相關論述有直接關連？德國學界看法不一。研究德國安樂死與優生問題的學者史慕爾(Hans-Walter Schmuhl)，認為密切相關，因為威瑪共和時期，安樂死早已是德國種族衛生學者的討論議題；在納粹掌權之前數十年，支持安樂死的學術論述已發展相當成熟與完整，這些學術論點為1930年代納粹政權執行安樂死鋪了一條坦途。可參閱：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2), 19. 但是同樣研究安樂死問題的歷史學者史華滋(Michael Schwartz)則認為，不能直接判定威瑪共和時期的安樂死論述，與納粹執行安樂死有直接關聯，因為無論是學術界或是社會大眾，從二十世紀之初至1940年代，對於是否支持安樂死都沒有達成共識，而且批判與反對安樂死之聲始終存在。參閱：Michael Schwartz, „Euthanasie“-Debatten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618, 664-665.

可歸責於少數醫學界人士「缺德」(Keine Ethik)、「反常道德」(pervertierte Moral)的犯罪行為？學者也無一致的看法。⁹但是由納粹執行滅絕生命的大屠殺行為，已清楚寫在德國歷史的章節中，不容駁斥與抹滅。這層歷史幽暗面，導致二次大戰後，西德對於安樂死問題持極度謹慎、保守，甚至拒斥的立場。威瑪共和時期因而成為德國歷史上，迄今唯一無禁忌、無包袱討論此議題的「美好時光」！

威瑪共和時期有關安樂死的論述相當多，但多散見於各種學術期刊，少有以專書形式出版。綜觀這些資料可看出，歐洲歷史上長期握有生、死正統解釋權的基督新、舊教會人士，對於安樂死支持或反對的議論不多。反而支持安樂死的各個學術領域人士，不僅發表眾多，而且論述內容大膽、新穎、深具顛覆傳統基督教死亡觀的性質。以致於目前歷史學界的研究中，對於基督教會立場的分析著墨甚少，或只給予極少的篇幅。¹⁰是否威瑪共和時期，支持安樂死的單方言論已成銳不可擋的主流，而基督教會已招架不住，無力堅持傳統對待生命的立場？或者基於信仰立場，基督教會根本拒絕此種行為，而無須加入論戰行列？此現象值得另外為文探討檢視。本文將以 1920 年出版後，立即引領德國學界熱切討論安樂死問題的《對於無生

⁹ 德國醫學倫理史學者費偉(Andreas Frewer)表示：德國醫學界在威瑪共和至納粹政權時期，有關安樂死的論辯過程與論點演變，仍然沒有釐清。參閱：Andreas Frewer, “Die Euthanasie-Debatte in der Zeitschrift *Ethik* 1922-1938: Zur Anatomie des medizinethischen Diskurses,” in Andreas Frewer, Clemens Eickhoff, Hg., »Euthanasie« und die Aktuelle Sterbehilfe-Debatte. *Die Historischen Hintergründe Medizinischer Ethik*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Verlag, 2000), 90. 費偉的文章發表於2000年，但是十多年來德國學術界關於此問題的討論然持續進行，而綜合性的論述仍然缺乏。

¹⁰ 有關近代德國安樂死問題的歷史研究，包含在近代德國優生、種族衛生，甚至滅絕猶太人的整體討論中。幾本此方面的重要著作，例如：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Hans 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Kurt Nowak, “Euthanasie” und Sterilisierung im “Dritten Reich”: die Konfrontation der evangelischen und katholischen Kirche mit dem Gesetz zur Ver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 und der “Euthanasie“-Aktion (Weimar: Böhlau, 1984); Ernst Klee, »Euthanasie« im NS-Staat. Die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2004); Udo Benzenhöfer,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這些重要學術專論中，都僅以極少的篇幅，提及基督教會的反應與立場。

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一書為探討核心，¹¹分析 1920 年代——德國政治的新時代，支持安樂死的主要論述中，究竟包含哪些重點？具有哪些特殊性？這些支持安樂死的論述，如何強勢的呈現安樂死的合理、合法性？其論述的架構與關鍵性說詞何在？藉此以瞭解二十世紀初期德國有關支持開放安樂死的觀點。

二、「安樂死」詞義的轉變——從靜態到動態

「安樂死」一詞自古希臘時代出現，至十六世紀初期之前，原意均指個人最理想的死亡狀態應是「和緩、舒適、美麗的死亡」，完全沒有外力介入之意，更無積極或消極死亡之說法。¹²然而在基督教生死觀尚未成為歐洲文明的主流價值之前，上古時代各地區，都出現過在特殊狀況下，由外力結束他人生命的實際情形。例如：廣為人知的斯巴達殺嬰、古希臘人與羅馬人處死年老者，或是無工作能力的奴隸；日耳曼人與斯拉夫夫人也處死身體殘疾者，與不治之症患者。¹³但是基督教則完全拒斥任何以外力縮短他人生命的作法，包括任何原因的自殺，也必須受到譴責。基督教的死亡觀認定：生命無論多麼痛苦與受折磨，自然死亡才是生命結束的唯一方式，其他死亡形式都違反、干涉、褻瀆上帝的計畫。隨著基督教影響勢力之擴張，

¹¹ 有關《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的基本出版資料與重要論點，請參閱本文第三部份「三、支持安樂死——賓丁與霍賀的論點」。

¹² 有關「安樂死」一詞的定義與轉變，除了可參考一般性的百科全書、辭典之外，學術性的百科全書與基督教神學的百科全書，例如：Cornelia Schmitz-Berning, *Vokabula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8), 215-218; Hans Dieter Betz, Don S. Browning, Bernd Janowski and Eberhard Jüngel, Hg.,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Handwörterbuch für Theologi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Bd. 2,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9), 1681-1682.

¹³ Karl Heinz Hafner, Rolf Winau,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Eine Untersuchung zu der Schrift von Karl Binding und Alfred Hoche,” *Medizinhistorisches Journal*, Bd. 9, Heft 3/4, (1974), 231. 對於安樂死在西方古代歷史之發展有深入解釋，另外也可參考Volker Zimmermann, “Die »Heiligkeit des Lebens«-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in Grundzügen,” in Andreas Frewer, Clemens Eickhoff, Hg., »Euthanasie« und die Aktuelle Sterbehilfe-Debatte. *Die Historischen Hintergründe Medizinischer Ethik*, 27-45.

中古時期開始，基督教教義成為歐洲文明的主要內涵。教會也成為所有價值的權威詮釋者，其對於生、死的看法，即理所當然形塑了歐洲正統的生死觀。

「安樂死」一詞的使用與想法，在沈潛十幾個世紀之後，曾短暫浮現。十六世紀初期英國哲學家莫爾(Thomas More, 1478-1535)與十七世紀的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兩人時代相隔將近百年，卻都提出支持安樂死的看法。認為旁人(例如：教士或醫師)面對受病痛折磨，極為痛苦的病人，可以扮演協助終結生命的推手。根據這種說法，「旁人」得以從「陪伴死亡」(Sterbebegleitung)的被動角色，轉變成為具有積極縮短他人生命，甚至引導進入死亡的主角。這種詮釋，促使安樂死之原意，產生重大變化。從「美麗的死亡」這種靜態地形容藝術性的死亡、死亡的藝術，或是有尊嚴的死亡，質變為具有動詞功能的實踐、執行死亡之手段與方式。甚至以「解放悲慘」的理念，取代「舒適、美麗」的靜態原意。而協助死亡的想法，也成為日後討論安樂死的重要概念。¹⁴雖然莫爾與培根的說法，在當時相當孤立，沒有引起共鳴，也無後續討論。但是已大膽異於中古時期以來的兩大傳統：

第一、違反基督教傳統的死亡觀。基督教堅信人之生命結束，僅能取決於上帝的旨意與計畫，不可由人為操控介入干涉。

第二、違反以「西波克拉提斯誓詞」(Hippokratischer Eid)所提示之醫學倫理：維護生命為醫師之職志與醫學的最高宗旨。而安樂死明顯有協助死亡與促成生命縮短之實，此與醫學傳統、醫學倫理完全背道而馳。¹⁵

歷史發展過程中已逐漸質變的安樂死原意，在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再度浮現檯面，而且以更邏輯、更犀利的方式論述死亡。1895年德國哥廷根大學博士生約斯特(Adolf Jost, 1874-?)出版《要求死亡的權利》(*Das Recht auf den Tod*)一書。這本僅僅五十多頁的小書中寫到：

¹⁴ 這種賦予醫師在死亡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的想法，尤其是指醫師應減輕瀕死之人的病痛，以助其死亡。莫爾的作品是《烏托邦》(*Utopia*, 1516)，培根的作品是*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1605.

¹⁵ 有關「西波克拉提斯誓詞」(Hippokratischer Eid)可參閱：Udo Benzenhöfer,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201.

當我們看到一位絕症病人，被無以言之的疼痛長期糾纏，未來仍然是絕望的久病不癒、毫無復原機會；當我們走過精神病院的每個病房，滿眼所見全都是癲狂者或是癱瘓麻痺者，我們具有人本能的同情心，那麼我們一定會急切的問：『難道這些人沒有權利要求死亡嗎？難道一個人性的社會沒有義務，以盡可能無痛苦的方式，讓他們死亡嗎？』……如果這種人自殺，我們應該，或是我們能夠裁判他嗎？事實上在實踐方面，國家與社會要採取立場。¹⁶

約斯特在書中處理的核心課題，即是積極協助死亡的安樂死。他強力支持在特定情況下，允許自殺，或是經由他人之協助，結束生命。對於生命價值的傳統看法，他提出質疑：

我們常說，人的生命具有無與倫比的高價值……但是這種價值的衡量標準究竟為何？我們都知道，我們十分珍愛的物品，之所以被視為物品，因為它對我們有用。¹⁷

何謂「有用」？他以人是否對於社會仍然有經濟效用，做為裁決生命存廢的標準，因此認為「比起健康者，病人消耗可觀數量的物資。一個病人或是一群病人，都會吸去許多人的工作勞力；要照護他們、等待他們，他們消耗了糧食與醫藥物資。」¹⁸

他認為有些人，例如：絕症病患與精神病患的生命價值，「不僅是零，甚至是負數，尤其是在絕症的狀況下，已經有極大的疼痛，還去照護他」，而且他也認為，照護這種無生存希望的病人，會造成照護者本身的情緒低

¹⁶ Adolf Jost, *Das Recht auf den Tod* (Göttingen: 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895), 6. 此處引自：Gerd Grübler,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Berlin: Lit Verlag, 2007), 23. 有關「安樂死」一詞之歷史轉變，可參閱：Christian Merkel, *"Tod den Idioten"-Eugenik und Euthanasie in juristischer Rezeption vom Kaiserreich zur Hitlerzeit* (Berlin: Logos Verlag, 2006), 43-44; Walter Kasper, Hg., *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Bd. 9 (Freiburg: Herder, 2000), 976; Hans Dieter Betz, Don S. Browning, Bernd Janowski and Eberhard Jüngel, Hg.,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Handwörterbuch für Theologi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Bd. 2, 1682.

¹⁷ Adolf Jost, *Das Recht auf den Tod*, 19. 此處引自：Gerd Grübler,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30.

¹⁸ Adolf Jost, *Das Recht auf den Tod*, 17. 此處引自：Gerd Grübler,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29.

落。¹⁹約斯特最終的訴求是：這些無可治癒的病人，死了比活著更好，解放這些悲慘生命，才是真正的善待他們。

十九世紀末期這本以前衛論點，闡述生命價值與結束生命方式的小書，由於約斯特的知名度太低，並未在當時的德國社會引起注意，更未促使學術界論辯。²⁰約斯特的論點也不能算是近代德國歷史上，首先提出支持開放安樂死的論點。²¹至少十九世紀中期，德意志地區著名的生物學者海克爾(Ernst Haeckel, 1834-1919)在 1868 年，也有類似支持安樂死的說法，只是沒有具體寫成專書。²²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約斯特這本只有五十頁的《要求死亡的權利》，卻可視為十九世紀最早將支持安樂死論點結構化，並以此為單一主題呈現的專著。若將書中的論點放在十九世紀末期以迄今，漫長的安樂死討論過程中檢視，更可看出其思考死亡課題的極端性與顛覆傳統之處。約斯特綜合提出了以下迥異於傳統的死亡觀點：

一、肯定人有「要求死亡」(Tötung auf Verlangen)的權利：絕症患者(含精神病患)應該擁有自主的死亡決定權，因為這是自我意志的實踐。

¹⁹ Adolf Jost, *Das Recht auf den Tod*, 17, 26. 此處引自：Gerd Grübler,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29, 34.

²⁰ 有關約斯特的生平，資料相當少。根據德國醫學史研究者班森霍夫(Udo Benzenhöfer)的資料，約斯特從奧地利到德國就讀哲學、數學與物理，出版《要求死亡的權利》後不久，父親就以年老病重為由，在奧地利自殺身亡。約斯特1897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動向與工作不詳，但是1907年底，到柏林擔任新聞記者，不久即患有精神妄想症，住在柏林的精神療養院後，1908年送回奧地利治療，卒年不詳，可參閱：Udo Benzenhöfer,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其中頁82，註釋5。

²¹ 班森霍夫認為，嚴格討論是否應該開放不治之症患者安樂死的議題，最早出現於1870年英國作家威廉斯(Samuel D. Williams jr.)以〈安樂死〉(Euthanasia)為題，發表文章。參閱：Udo Benzenhöfer,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134.

²² 海克爾認為，面對無可治癒的精神病患、癌症患者，先天缺陷的嬰孩，為了減輕這些病患及其家屬無盡的痛苦，法律應該允許醫師給予嗎啡，使其死亡，而且這完全符合基督教義中「愛鄰人」的誡令；但是現今之法律卻懲罰這種事情。海克爾於1915年大戰期間出版的著作中表示，自己在1868年與1904年即已提出以上的觀點。Ernst Haeckel, *Ewigkeit. Weltkriegsgedanken über Leben und Tod, Religion und Entwicklungsleben*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Keimer, 1915), 34-35. 關於海克爾的論點分析與歷史評價，可參閱：Jürgen Sandmann, *Der Bruch mit der humanitären Tradition. Die Biologisierung der Ethik bei Ernst Haeckel und anderen Darwinisten seiner Zeit*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90).

- 二、**認可他人得以「協助死亡」(Sterbehilfe)**：實踐這種自我意志的死亡，也就是結束生命的行為，可藉由他者——即國家、公權力擁有者，協助完成，而且無須負擔法律刑責。
- 三、**經濟計量的生命價值觀**：個人對於社會有用，或是無用，成為衡量生命是否續存的重要量尺，甚至是唯一量尺。因此國家財政負擔、社會利益、物資消耗等之計量，與個人生命的存廢，具有直接緊密關係，不可迴避與忽視。

約斯特身處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歐洲新時代——「現代」來臨，一切傳統價值觀都在鬆動、批判、省思、重新詮釋。例如：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強調的生存權，百年以來，持續發酵成為個人至上的自我決定權；傳統自由主義試圖壓制的政府權勢，至十九世紀末，又要求公權力擴大，甚至介入個人的生、死問題。在諸多「現代」的轉換情況中，受挫最嚴重的是基督信仰的威權地位。約斯特作品中的「個人意志」、「公權力結束生命」、「自殺除罪化」、「以經濟計量生命價值」等說法，每一項重點都無視於千年以來，歐洲基督信仰詮釋生、死的權威立場。每一個論點都深具強力的顛覆力道，自認以現代之科學「新」姿，挑戰傳統的信仰「舊」思；以關懷當代苦難、積極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信念，挑戰他認為：只處理死後、消極面對疼痛，又膽怯介入死亡的基督信仰論述。「現在精神疾病與生理疾病已無可醫治之人，儘管已承受極大的痛苦，卻被迫只能等待自然死亡」。²³而所謂的「等待自然死亡」，即指基督信仰認定生命終結的唯一方式，並以此長期約束國家法律，不得介入生命結束的重要說詞。約斯特與其後支持安樂死的人士，完全無法認同這種宗教信念之網綁，而欲徹底轉變。

三、支持安樂死——賓丁與霍賀的論點

德國學界進入討論安樂死的熱潮，於 1920 年德國當代著名的刑法學者賓丁(Karl Binding, 1841-1920)與弗萊堡大學精神醫學講座教授霍賀(Alfred

²³ Adolf Jost, *Das Recht auf den Tod*, 6. 此處引自：Gerd Grübler,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23.

Hoche, 1865-1943)，合著《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一書之出版而開啟。²⁴這本只有薄薄六十頁左右的著作，卻由當時著名的學術出版社發行，至1922年已有第二刷印行。兩位作者分屬相異的學術領域，卻能跨學科共同處理安樂死課題，不僅在當時罕見，今日亦不多見。²⁵

(一)「滅絕無生存價值者」的法律基礎

此書的第一部份是賓丁所著「法律部分的闡述」(*Rechtliche Ausführung*)。他以感性的筆調，展開全書的論述：

我敢於在我生命將終結之前，還把一個問題講出來，這其實是我長久以來思索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十分棘手，且難以找到解答，因此大部分的人都迴避。²⁶

賓丁苦思的問題即：是否應該在法律層面，有條件開放自我，或是他人協助終結生命的行為，即自殺與安樂死之開放？他在文中也引用約斯特《要求死亡的權利》之詞，認為事關：「我們一直堅持的道德與社會看法」。²⁷約斯特的論點，終於在二十多年之後，找到知音，有了後繼者，開始發酵，也逐漸在學術界與社會產生影響力。或許賓丁並非真正在垂暮之年，才開始思考安樂死的問題。但是顯然這位在當時法學界具有重量地位的學者，想以畢生的法學知識、學術實力與知名度，為世界大戰後德國社會面臨的現實苦難問題，提出確實可行的解決之道。²⁸

²⁴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Leipzig: Felix Meiner, 1920). 德國法制史研究社群在2006年重新印行此書，由BWV·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出版，書前並附上法蘭克福大學的刑法學與犯罪學教授Wolfgang Naucke長篇導言，以利讀者瞭解此書之內容與重要性。全書有三分之二是賓丁從法學觀點之論述，此書出版之時，賓丁已去世。

²⁶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

²⁷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

²⁸ 賓丁對於自殺與安樂死之關注，並非只出於自身年紀大的感慨，或是出自從哲學立場探討死亡的興趣，而是極可能出於實際的國家關懷，解決社會問題。此點可由他在註釋48的補充說明看出，他先引用霍賀的敘述：「所有戰爭強權，在這次世界大

賓丁以「自由是所有人類權利之首」，「因此，他對於自己的生命，有天賦的自主性」的說詞，作為鞏固與支撐論點的重要基石。²⁹藉由這個歐洲自啟蒙時期以來，已無可撼動的人權至上神聖原則，建構了自我終結生命——自殺的合理性。他認為：

第一、自殺是法律無可禁止的行為，不可處罰；基督教藉由稱說上帝觀點，否定自殺、譴責自殺，但是「新約關於這個問題，根本隻字未提」，而「所謂十誡之中的『你不可以殺人』，當然與自殺無關」。³⁰

第二、既然自殺並非違反個人意願，更不是觸犯法律的犯罪行為，則不應與謀殺、打死人的犯罪行為等同視之。同理，自殺的參與者、協助者——安樂死執行者，也不應受處罰。³¹

以上這些論點，顯示了賓丁對於自殺與安樂死的強力支持。當然他也知道，若是「錯誤判斷死亡狀況，這種過失致死，會導致『安樂死』惡名滿天」。³²因此提出以下三種群體可以施行安樂死：

- 一、無可醫治之疾病，或是無可拯救之外傷患者。這些病患意識清楚，完全瞭解自己的狀況已無藥可救，而強烈想要解脫生命。尤其是不治之惡性腫瘤病患，無藥可醫治的肺結核病患，致命性的外傷患者。賓丁說：「我認為，不需要等到他們產生無法忍受之疼痛，才『要求死亡』。同情他們，就是讓這些無希望者沒有疼痛。」³³

戰的整體損失，大約要估計到一千兩百萬至一千三百萬的死亡人數」。再引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報「前進」(Vorwärts)之最新估計，「這場戰爭德國陸軍死亡1,728,246人，戰艇24,112艘，損失的價值，超過一切計算」。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26.

²⁹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6.

³⁰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7, 9.

³¹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13-15.

³²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19.

³³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28.

二、天生或是後天麻痺癱瘓，而進入末期階段，無可治癒的精神病患、心智障礙者(BLÖ DSINNIGE)。³⁴賓丁認為：

他們對於生存或死亡，都沒有任何意願。…他們的生命已經徹底沒有目的，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感覺。對他們的家屬、對於社會而言，他們都是可怕的沉重累贅。³⁵

另一方面賓丁也承認，如果讓這些人死去，他們的母親與長期照顧的照護者，將會十分難過，「因為這些人非常需要照顧，在此情況下，會使人產生一種使命感，全神貫注於完全無生存價值的生命，年復一年無限地延展下去。」³⁶

三、原本意識清楚的健康者，因某種重度、致命的傷害，而陷入昏迷狀態，就算他們從昏迷中甦醒，卻仍然處於巨大的悲慘之中。賓丁認為「出於同情」，這種人應施予安樂死，這「不是掠奪生命，反而是使他免於可怕恐怖的終結」。³⁷

賓丁絕無意使他的界定變成「開放殺任何人」(die Freigabe der Tötung an Jedermann)的藉口。³⁸因而將論述內容緊扣無可治癒的病患、無以承受之疼痛、同情而助其解脫……等等情形。但是他對於生命價值的基本想法與立場，接續了前述約斯特的大膽論點，甚至更直接了當地反問：

是否有些人的生命，使法律承認且欲保護之利益的特質已強烈喪失，這種持續的生命，對生命的承擔者與社會一樣，已失去所有價值？³⁹

³⁴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30. 賓丁文中所用的Blödsinnige一詞，在今日德語為罵人、嘲笑之用，中文可譯為：白痴、智障。學術文章已不再使用，但是，此字在威瑪共和時期，並無罵人之意。

³⁵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30.

³⁶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30.

³⁷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32.

³⁸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32.

³⁹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因此他根本上也與約斯特同調，認為個人生命之價值與持續存活的意義，完全取決於是否對整體社會有用；若是判定無用，即為社會的負擔與累贅；而有權利「判定無用」的裁決者，可以是病患本身——自我決定終結生命，也可以是家屬，或是國家賦予公權力之第三者，由其決定施予安樂死。這種對生命價值與處置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論點，由《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的第二部份——霍賀所寫的「醫師方面的意見」(Ärztliche Bemerkungen)，繼續闡述。

(二)「滅絕無生存價值者」的經濟合理性

相較於賓丁已是極受當代法學界肯定的學者，霍賀則是爭議性的人物。他在文中不僅使用極端的措辭，而且有令人瞠目結舌的觀點。例如：他認同醫師可以因學術研究之需要與興趣，在特定情況下，終結特殊疾病者的生命。⁴⁰而影響力更大之論點，則在於強調生存價值與經濟衡量之間有直接關連性，他說：「這些心智完全死亡者，從經濟關係而言……他們的存

Maß und ihre Form, 26. 賓丁在此句話的註釋中，特別引述約斯特的看法：「人生命的價值，不僅可以是零，而且可以是負數。」

⁴⁰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45-46. 霍賀在文中舉出自己年輕時擔任助理所遇到的情況為例：一位患有奇特腦部疾病的孩童，院方很確定即將在24小時之內死去；此孩童所患的疾病，極具學術研究價值。如果孩童死於醫院，「我們就可以解剖屍體，檢驗之時，找到結果。」但是孩童的父親要求，將小孩帶回家。「我們都知道，如果孩童在死前被接回家，我們解剖屍體的可能性就沒了。」霍賀表示，當時他可以用嗎啡注射這位「反正絕對將死的人」，讓他先死在醫院。但是，「我畢竟沒有做這件事」，因為「我個人對於學術知識的期望，還無法使我提出夠份量的法律權益之理由」。因此，「縮短生命不是醫師職責」的理念，說服了霍賀，使他沒有對瀕死的小孩施打致命的嗎啡。德國醫學史教授費西特訥(Gerhard Fichtner)批判霍賀這種對於自然科學幾近瘋狂的興趣，時常有盲目、匪夷所思之舉動。在1976年費西特訥批判霍賀的文章中，引用霍賀自己的陳述，說自己很喜歡進行試驗，例如：「砍斷的頭顱，用適當的化學液體，經由機器輸血，使他再度恢復意識」。Gerhard Fichtner, "Die Euthanasiediskussion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lbin Eser, Hg., *Suizid und Euthanasie als human -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Problem*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 1976), 25-26.

⁴¹ 賓丁文中所用之*die geistig Toten*一詞，在此翻譯為「心智死亡者」。Karl Binding,

出的花費計算：粗估全德國有二萬至三萬的精神病患與心智障礙者(die Idioten)，每人每年的療養院照顧費用大約是 1,300 馬克；他們的平均壽命約為五十歲，耗費「糧食、衣服、暖氣等巨大的資本，這種毫無生產力可言的目的，剝奪了國家財富。」⁴²而且「迄今，我們無法禁止讓這些壞損之人繼續繁殖」。⁴³在生存權利方面，他認為這些人已喪失主、客觀的生存權，「所有狀態都已失去價值的心智死亡者，他們主觀生存的權利，與客觀的目的性、必要性之間，根本就是矛盾」，這些人既沒有能力要求生存，對於其他思考過程也完全無能。⁴⁴

這樣的語詞使用與陳述，是否太過冷酷、缺乏同情心呢？霍賀卻反駁，對於這些「無生存價值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有同情心，是「無法根除的錯誤想法，或是稍微好一點的思考薄弱」，而且只是一般人將自己的想法、感覺，投射在這些「無生存價值生命」者身上；真正的同情，應該是讓他們活著時，或是進入死亡階段，都「沒有痛苦，也沒有與痛苦同在」。⁴⁵霍賀以醫師的立場，強烈支持安樂死，而且與賓丁一致地賦予安樂死合理性與道德性。他甚至大膽地說：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認為，清除心智已完全死亡者，不再是犯罪，不再是不道德的行為，不再是只憑感覺的粗野，而是一個允許、有必要的行動。⁴⁶

多位學者都認為，賓丁與霍賀在《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0.

⁴²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1. 有關霍賀在文中極端措辭用字的陳述，也可參閱：伍碧雯，〈納粹政權對於「無生存價值」德國人的處置〉，頁293。

⁴³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2.

⁴⁴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4.

⁴⁵ 「沒有痛苦，也沒有與痛苦同在」原文是 wo kein Leiden ist, ist auch kein mit-Leiden。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5.

⁴⁶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3.

其範圍與方式》中侃侃而論的死亡方式，在德國討論安樂死課題上，絕對是值得標記的重大里程碑。⁴⁷在這本共同著作出版後，當時代其他支持安樂死的說法，已無法再超越，而只能更接近或認同兩位作者的想法；反對安樂死者，更無法迴避這此書，必須先提及書中的說法，再加以反駁。⁴⁸能成為里程碑之作品，首先在於天時、地利之因。此書在 1920 年，即世界大戰結束後兩年出版，當時德國政、學界與一般大眾，都深刻感受到戰後生活水準下降、青、壯年人口死傷、國家競爭力與未來財、經狀況不明確……等等，逐漸浮現的現實困境。⁴⁹因此，支持安樂死的約斯特作品，在十九世紀末尚不受青睞，找不到共鳴。但是二十世紀初期，在戰火猛烈衝擊之下，傳統政治體制都已重挫，連帶許多傳統價值觀也受到震撼。對於死亡的看法，雖然未必立即改觀，卻有重新檢視的可能。這本支持安樂死的作品，因而得以在價值觀鬆動與重塑之際，快速成為社會話題，變成引領各界討論的時髦之作。

能成為討論安樂死經典之作的第二個因素，在於此書內大膽又前衛的論點，以及毫不避諱的極端遣詞用字，在社會上產生了指標意義，後續影響極大。從名詞使用方面而論：文中以「無生存價值生命」、「心智障礙者」、「心智完全死亡者」、「無用的存在者」(Ballastexistenzen)、「壞損之人」(Defektmenschen)等名詞，稱呼精神病患，形容不治之症患者。這種讀起來毫無憐憫、欠缺尊重之意的表達，不僅在學術著作中罕見，而且在六十頁的作品中密集重複出現，促使這些名詞在德國社會逐漸流行。尤其書名中更清楚以「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為題，公開賦予「滅絕」(Vernichtung)為合

⁴⁷ 2004年12月4日德國萊比錫大學，針對《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一書內容與影響，召開學術研討會，多位醫學史研究者發表論文，均指出賓丁與霍賀的合著，在當時德國社會極具影響力。可參閱：Ortrun Riha, Hg.,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Beiträge des Symposiums über Karl Binding und Alfred Hoche am 2. Dezember 2004 in Leipzig (Aachen: Shaker Verlag, 2005). 相似的意見也可參閱：Udo Benzenhöfer,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89-90; Ernst Klee, »Euthanasie« im NS-Staat. Die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19.

⁴⁸ Karl Heinz Hafner, Rolf Winau,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Eine Untersuchung zu der Schrift von Karl Binding und Alfred Hoche", 233.

⁴⁹ 伍碧雯，〈納粹政權對於「無生存價值」德國人的處置〉，頁292-293。

理終結生命的想法。這個組合用詞，也逐漸成為相關專業書籍、教科書、期刊文章的標題。⁵⁰整體而言，書中直接的用詞、理性且似乎符合學術規範的論述，不僅在當時造成衝擊與震撼，即使在今日閱讀，也令人深思與驚訝。

有學者估計，從 1922 年至 1933 年之間，共有七份以安樂死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其中法律與醫學領域的六份博士論文標題，均有「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或「處死」等字；只有哲學領域的一份論文以「安樂死」一詞為題。⁵¹若以 2007 年出版的《德國安樂死討論史料，1895-1941》(*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為例，其中匯集了多篇當時代論述安樂死的重要文章。從中可計算出，在 1920 年《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出版之前，討論安樂死問題的文章標題，大多使用「安樂死」一詞；兩人的合著出版後，至 1933 年的三十八篇文章，其中有二十篇文章的標題，使用「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一詞。⁵²「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不僅成為安樂死的同義詞，而且已有取代之勢。1920 年之前，學術界若非消極討論安樂死，就是避而不談。但是 1920 年之後，不僅公開討論安樂死、支持安樂死，還加入了「滅絕」的思維元素。以「滅絕」思考人類生命，這是終結生命想法的巨大轉折。

此外賓丁與霍賀的論點也為病患自我決定之自殺、旁人協助其自殺等狀況，破除傳統道德、宗教信仰、刑法規範的禁止與指責。他們認為，國家有權力決定病患的死與不死，醫師也未必以「拯救——救活人命」為唯一職責，而且所謂「拯救」也可以有「滅絕悲慘生命，行解脫之實」、「終結痛苦生命，行憐憫之實」的新解釋。作者當然也強調實際執行「生命滅絕」、開放安樂死，絕對要有嚴格的判斷與考核過程，以免執行粗糙與誤用。⁵³在

⁵⁰ 根據德國法學博士梅克爾(Christian Merkel)的研究，當時多本法律專業書籍、教科書的書中關鍵詞索引，都找得到「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詞條。Christian Merkel, "Tod den Idioten"-Eugenik und Euthanasie in juristischer Rezeption vom Kaiserreich zur Hitlerzeit, 48-49. 此外亦可參考：Karl Heinz Hafner, Rolf Winau,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Eine Untersuchung zu der Schrift von Karl Binding und Alfred Hoche", 233-234. 註釋所列出的文章。

⁵¹ Gerhard Fichtner, "Die Euthanasiediskussion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24.

⁵² Gerd Grübler,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5-8.

⁵³ 基本上賓丁認為，病人是否實施安樂死的決定過程，除了尚有意識的病人本身應先提出死亡意願之外，必須由國家法務人員、非病人的主治醫師、精神科醫師、以及

支持開放安樂死的期望下，賓丁與霍賀不僅賦予國家新的干涉權、介入權，也擴展了西方醫學領域。從傳統的治療醫學與預防醫學領域，延伸到死亡醫學、臨終醫學的「新」範疇。這是否可以評價為西方現代化來臨產生的進步現象？實值得商榷，但是支持安樂死的理念，足可視為西方傳統人權、自由權、生命權的重新詮釋與變化。值得一提的是，賓丁在書中已為實施安樂死可能產生的誤判，安排合理的說詞：

所有人類的行為，都會產生錯誤，沒有人會傻傻的讓錯誤產生，所有對於當事人有用、有治癒效果的行為，都不應該有失誤……縱使有錯誤的危險性存在，還是必須讓善與理性發揮出來。⁵⁴

他認為開放安樂死，是為無止盡的悲慘生命找尋解脫的方式，這種解放悲慘生命，難道不是符合善與理性嗎？另一方面霍賀接續強調的國家經濟效益，為國家節省照護費用，難道不也是符合善與理性嗎？⁵⁵

四、對於支持安樂死的回應

(一) 安樂死的道德意義——解放悲慘生命與解救國家經濟

客觀而言《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的論點，既非獨創，更非首開風氣之先的觀點。但是出版後，確實在德國學界與社會引發持續的論述，掀起討論之波瀾。然而這些論述，卻不是激烈的正、反兩方論辯。因為從當時出版的相關文章數量來看，認同賓丁與霍賀論點，以及贊同開放安樂死的文章篇數，大大超越反對者的發表。尤其有數位學者立即為文表態，支持賓丁與霍賀的想法，這如同與其攜手，共同宣傳安樂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更為開放安樂死的立場奠定堅實基礎。

病人信賴之醫師共同決定。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34-37.

⁵⁴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37.

⁵⁵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0-51.

例如：醫學領域的杜賓根大學教授高普(Robert Gaupp, 1870-1953)在 1920 年立即表示，極為樂見賓丁與霍賀想法之發揚。他認為，「對於沒有價值的生命，我們予以特別溺愛與照顧，同一時間在另一個不明顯的地方，有價值的生命卻必須很悲慘」，他形容此種情形是「錯誤的人道」。⁵⁶並舉出世界大戰期間的例子：當時德國國內遭逢饑荒，一般人民得忍受飢餓，甚至因餐風露宿而得肺炎，但是「沒價值無可治癒的精神病患」卻有充足食物可吃，「我寧可將那些無可治癒精神病患，經常收到農村親戚送來的奶油與肉，分給有價值的人。」⁵⁷

同年十一月柏林大學的刑法學教授克雷(Karl Klee, 1876-?)，也在公開演講中讚揚賓丁與霍賀的作品，認為是「一部醫學家與法學者共同合作，而令人高興的成品。」⁵⁸他說：「我們追求的，就是完全失去生存價值生命的滅絕；如果對病人而言，所有結束生命的理由都符合，這也是承認個人有死亡的權利。」⁵⁹而且他強調這種想法，完全契合基督信仰所要求「純粹憐憫的行為」，更何況「今日的適用性，就是明日的合法性」，他甚至相信未來宗教界，也會接受優生、種族衛生的衡量價值，進而成為整體倫理觀的一部份。⁶⁰克雷的論述，間接批判了傳統基督教討論生死問題時，只堅持永恆不變的原則。他主張改採變動、相對的價值觀。這種對於基督教生死觀的挑戰，在西方歷史發展上雖然早已屢見不鮮，但是直接連結到以安樂死

⁵⁶ 高普所說「錯誤的人道」，原文為falsche Humanität。他以「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為題，在刑法雜誌(*Deutsche Strafrechtszeitung*)上發表文章。Robert Gaupp,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Deutsche Strafrechtszeitung*, H. 11/12 (1920.07), 336. 此處引自：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Buchverlag Union, 1992), 81.

⁵⁷ 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2.

⁵⁸ 這是克雷於 1920 年 11 月 19 日在法醫學與醫學的聯合會上發表的演講。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4.

⁵⁹ 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4.

⁶⁰ 「今日的適用性，就是明日的合法性」原文是das Zweckmäßige von heute ist das Gerechte von morgen。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4.

的方式「滅絕無生存價值者」，並且將這種人為結束生命的行為，詮釋為深具現實必要性、社會合理性，而且堅信安樂死並沒有違反宗教道德的說法，確實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特殊展現。賓丁與霍賀的論點，在此處發揮了極大影響力，成為催促傳統生命觀急速扭轉的重要推手。1930年霍賀更被當時著名的生理學者，也是《倫理》(Ethik)雜誌的主編亞伯德哈頓(Emil Abderhalden, 1877-1950)視為學術界的典範。⁶¹

在《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出版後，同年秋天由薩克森地區兒童療養院醫師梅特澤爾(Ewald Meltzer, 1869-1940)，向兩百位療養院中智障兒童的父母發出問卷，調查他們是否支持安樂死。梅特澤爾的問卷只設計了四個問題：⁶²

- 第一、 如果經由專業判斷確定，您的小孩患有無法治癒的智障，您是否同意，無論如何都採取無痛苦的縮短生命方式？
- 第二、 是否只有當您不再能照顧您的小孩，例如您過世了，才同意？⁶³
- 第三、 是否只有當小孩承受身體或是心理重度劇痛，您才同意？
- 第四、 前述第一至第三個問題，您的夫人會如何回答？

調查共發出 200 份問卷，回收了 162 份，其中 119 份同意對自己的小孩實行安樂死，43 份持反對意見。這個結果梅特澤爾相當意外：「我沒有

⁶¹ 在亞伯德哈頓的主持之下，1933年起《倫理》即是支持政府執行安樂死的重要雜誌。參閱：Andreas Frewer, "Die Euthanasie-Debatte in der Zeitschrift Ethik 1922-1938: Zur Anatomie des medizinethischen Diskurses," 91-93.

⁶² 此問卷發出之時間在1920年秋天，當年的問卷中，梅特澤爾清楚表示：「經由一位著名的法學家——在萊比錫過世的大學教授賓丁，與一位非常有名的醫學的大學教授，最新出版的作品，將舊的問題重新提出」。1920年梅特澤爾是否回收問卷之後，立即公開調查結果，目前不得而知。但是1925年在其文章〈縮短「無生存價值」生命的問題〉(Das Problem der Abkürz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中，不僅公布5年前的問卷結果，而且將回覆者的意見詳細放在文章當中。Ewald Meltzer, *Das Problem der Abkürz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Hall an der Saale, 1925)，此處引自 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2-83. 梅特澤爾較完整的文章收錄於 Gerd Grübler,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299-311.

⁶³ 此處「才同意」是指：同意採取無痛苦的縮短生命方式。以下問題「第三」也相同。

料到如此，相反的結果才是我的預期」。⁶⁴以問卷調查方式產生統計數據，在日後安樂死討論中也十分罕見，而僅以數據呈現的調查結果，對於支持安樂死的陣營是較為有利。

1920年之後有關安樂死——「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討論，並未侷限於法律與醫學領域內。屬於右派、民族主義立場的威瑪出版商兼作家霍夫曼(Gerhard Hoffmann, 1887-1939)，以筆名於1920年發表的《力量之道德》(*Moral der Kraft*)中，提出了將體弱久病的「可憐人」送交「保健警察」(Gesundheitspolizei)處理的特殊想法。⁶⁵1922年發表的《人類從悲慘中之解放》(*Die Erlösung der Menschheit vom Elend*)一書，直接提出實施安樂死的方式，應該完全寄望於醫師。他認為醫師的首要職責，就是維護國民的健康，「基於此職責，而要求無可治癒者之滅絕」。他強調地區性的醫師，應具有選擇健康者與淘汰不治之症患者的重要任務，也應該組成「篩選委員會」(Selektionskommission)，到各地區篩選人民，「檢驗全體人民的健康狀況，以及淘汰被不治之症糾纏的患者」。⁶⁶霍夫曼的篩選與淘汰論述，也是循著賓丁與霍賀論點的脈絡，一貫發展而成。霍夫曼以非醫學、非法律、非學術專業領域的社會人士，發表支持安樂死的論述，也間接說明安樂死想法，已逐步邁出學術界，而有擴及社會大眾的發展趨勢。

從十九世紀末至1920年代，詮釋安樂死的論述很多，但是符合當時代想法的安樂死定義究竟為何？1926年一本學術著作中的簡要說法，幾乎含

⁶⁴ 梅特澤爾刻意將四個問題設計成只能回答「是」或「否」。他在〈縮短「無生存價值」生命的問題〉中指出，問卷結果：119份回答「是」；43份回答「否」。雖然統計數據呈現支持對自己小孩實行安樂死的父母佔了絕大多數，梅特澤爾說：「對我而言，那43張反對票的重要性大於那119張贊成票。」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3; Gerd Grübler,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311.

⁶⁵ 霍夫曼(Gerhard Hoffmann)的筆名為Ernst Mann，1920年於威瑪出版的作品為*Die Moral der Kraft* (Weimar: Biewald, 1920)。此處引自：Karl Heinz Hafner, Rolf Winau,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Eine Untersuchung zu der Schrift von Karl Binding und Alfred Hoche”, 233. 文中註釋46。

⁶⁶ 1922年霍夫曼繼續以Ernst Mann為筆名，於威瑪出版*Die Erlösung der Menschheit vom Elen* (Weimar: Fink, 1922)一書。此處引自：Gerhard Fichtner, “Die Euthanasiediskussion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24.

括了過去眾多討論的重點：

我們對於安樂死的瞭解是，從優生的、種族衛生的，以及經濟的理由，經過一定程度的觀察，謹慎排除任何誤用，以無痛苦的人道方式，除去身體無價值的生命，也就是精神死亡者與出生即先天殘疾者，他們已不具有主、客觀的生存價值。⁶⁷

當然也有更為極端的想法，就是對於「所有這些身體或是道德方面低價值者，無論他個人同意與否，一律殺死。」⁶⁸

(二) 薄弱的質疑與批判

整體而言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敏感的安樂死問題在德國學界與社會已不是禁忌，而是各界公開討論的課題。自從《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出版後，贊成開放安樂死想法的聲勢急速增加，這方面的論述，已從如何判定不治之症的醫學層面、如何協助死亡除罪化的法律層面、如何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的政治、經濟層面，以及如何釋放家屬憂傷的親情、道德層面等，逐步建立紮實的開放安樂死論述基礎、架構。甚至已經為不治之症患者預設了合理接受死亡的立場，營造輿論情境，認為他們有強烈意願，想結束生命。藉此形塑安樂死具有個人求死權利的正當性、合理性，以及社會應該接受這種出於憐憫，協助悲慘之人解脫悲慘生命的必要方法。然而儘管學界與社會，都有支持開放安樂死的強勢發表，卻還是必須正視此想法，有違歐洲千年以來基督教塑造的生死觀念。安樂死論點所包含的：自我決定之生命權、國家允許協助他人結束生命、以人為方式縮短生命等重點，以及使用「滅絕」、「無生存價值之生命」概念，

⁶⁷ 這是出自巴特(Fritz Barth)1926年的著作《安樂死——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之問題》(*Euthanasie: das Problem d.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巴特的生平已無從得知，只知道他於1924年以《安樂死》(*Euthanasie*)為題，取得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Fritz Barth, *Euthanasie: das Problem d.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 (Heidelberg: Hörning, 1926), 26. 此處引自：Christian Merkel, “*Tod den Idioten*”-Eugenik und Euthanasie in juristischer Rezeption vom Kaiserreich zur Hitlerzeit, 18.

⁶⁸ Fritz Barth, *Euthanasie* (Heidelberg: Braus, 1924), 5. 此處引自：Christian Merkel, “*Tod den Idioten*”-Eugenik und Euthanasie in juristischer Rezeption vom Kaiserreich zur Hitlerzeit, 44.

每一項都涉及評判他人的生命價值、決定他人生命存廢的裁決。此與基督信仰之生命觀大相逕庭，在此也呈現出：我是即他非、我非即他是的「現代、科學」對抗「傳統、宗教」，兩種無可妥協，也無可互動的尖銳對立。

如何說服社會上廣大的基督信仰者，從傳統基督教的死亡觀轉向，認可與支持安樂死的想法？這是安樂死支持者必須面對的問題。以理服人，應該是正確之道，賓丁對於基督信仰提出合理的質疑：難道充滿愛的上帝，會希望人類經過無止境的身體與心靈之折磨才死亡嗎？⁶⁹自殺是否為殺人違法行為？對此聖經新約之中，根本「隻字未提」，這是賓丁所提出的理由。⁷⁰刑法學教授克雷也表示，安樂死的觀念與基督信仰所要求之「純粹憐憫的行為」，完全吻合。⁷¹1920年代中期，對於賓丁與霍賀安樂死論點持質疑態度的兒童療養院醫師梅特澤爾也表示，「有一些神學代表認為，此行為並不違反基督信仰的精神，因為這種行為是出於對受苦之人最純正的善意，一種深刻的道德行為。」⁷²但是這些輕描淡寫的說理之詞，只予人淺層，又不具邏輯辯證的說服力道，完全無助於建立科學界與宗教信仰界之間的互動，更遑論與基督信仰的生死觀對話。這種現象並不是支持安樂死立場者，在爭取基督信仰群體時的疏失，或是刻意迴避。而是有鑑於「新時代」來臨，若安樂死能合法化，其推動與實踐的主力將來自於國家、議會，而非

⁶⁹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6.

⁷⁰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7.

⁷¹ 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4.

⁷² Meltzer, Ewald. *Das Problem der Abkürz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此處引自 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2. 也可參閱 Gerd Grübler,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300. 評估梅特澤爾對於安樂死的態度，絕對不能以其在納粹時期反對納粹執行強制安樂死與絕育的立場，而簡化為他從1920年對療養院病童父母發出問卷開始，即已「完全反對」安樂死。從梅特澤爾1920年代的論點，甚至到1933年納粹登台之初所發表言論，都可看出他對於安樂死「原則上」反對，但是病人在特定情況下(例如：久病、同時又重度昏迷、且家屬認為病人受盡折磨)可以施予安樂死。參閱：Andreas Frewer, "Die Euthanasie-Debatte in der Zeitschrift Ethik 1922-1938: Zur Anatomie des medizinethischen Diskurses," 93-95.

教會。若希望扭轉民眾死亡觀念、接受安樂死，則由政府主導的教育推廣與政府宣傳，比透過教會宣導更迅速。現實潮流已轉變，實無必要大張旗鼓與基督信仰的死亡觀正面交鋒，甚至挑釁論戰，更無須特別營造溝通的管道。當代究竟誰有能力實質解決、解放、解救，以及解釋這群「悲慘生命」、這群所謂「無生存價值者」？支持開放安樂死人士的立場與信心已十分明顯，並堅信自己站在憐憫、道德，而且屬於善的一方。

在 1920 年代——這個德國第一次民主共和的核心時期，基督信仰團體，無論新、舊教會，在面對來勢洶洶的支持安樂死言論時，鮮有回應，更缺乏集體性的反駁。反而是有零星基於科學立場的批評。例如：醫學博士布萊恩艾克(H. Brennecke)於 1921 年在精神醫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其中強烈指責賓丁與霍賀的安樂死論點是：「包藏在法律規範與自然科學無誤的外衣之下」的說法，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自私主義之嘴臉」，還「結合了物質性生命觀的破壞污染」。⁷³他批評賓丁與霍賀的說法是「物質主義的邏輯性結果」，而這種物質主義，「認為受苦之人，沒有更高的道德性，只有無可拯救的錯亂，以及隨之而來折磨人的痛苦」，「我抗議這種錯誤的方向」。⁷⁴

類似的批判還來自於醫學博士華施庫恩(Wausckuhn)的指責，認為賓丁的用詞不精確，具有醫學背景的霍賀，身為合著者，不僅未加以澄清，反而還從醫學角度接續使用「精神已死的狀況」、「完全的心智障礙」這類的形容詞，最後再認定「他們的存在，最嚴重的造成全體普遍的負擔」。⁷⁵錯

⁷³ H. Brennecke, "Kritische Bemerkungen zu der Forderung Bindings und Hoches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Psychiatisch-Neurologische Wochenschrift*, 23 (1921/1922), 6. 此處引自：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5-86.

⁷⁴ 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6.

⁷⁵ 華施庫恩在文中舉例指出，賓丁的用詞中，「精神弱者」(Geistesschwachen)、「無法治癒的智障者」(unheilbar Blödsinnigen)、「智障療養院」(Idiotenanstalt)、「智障者照護療養院的主管們」(Vorstehern dieser Anstalten zur Pflege der Idioten)等用詞都不夠精準。Dr. Wausckuhn,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Psychiatisch-Neurologische Wochenschrift*, 24 (1922/1923), 215. 此處引自：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8.

誤判斷還包括霍賀所舉出的數據有灌水之嫌，華施庫恩批判為「粗糙的遊戲」，因為書中既說全國有兩萬至三萬名精神病患；註釋中又解釋有三千至四千人是「完全沒有精神狀態之生存，與周遭完全沒有互動關係」。⁷⁶那麼所謂「無生存價值者」、應該被「滅絕」者，究竟是「兩萬至三萬人」或是「三千至四千人」？華施庫恩更反對兩位作者提出由國家立法以實踐安樂死，因為如果「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真的成為國家政策，那麼：

公立的精神病院最有危險，有些人就會在那裡被處死，這是之前絕對無法想像到的事情。人民將有理由對公立精神病院完全失望，信任感永遠喪失。⁷⁷

如果安樂死開放，則醫護人員將是直接面對問題與處理病患的第一線人員。支持安樂死人士會視醫護人員為解放、解救悲慘生命的協助者、對於生命的憐憫者；但是反對安樂死人士，則會形容醫護人員是殘害、奪取他人性命的劊子手、死亡的推手。在 1920 年代眾多討論安樂死的文章中，幾乎看不出療養院醫護人員對於安樂死問題的具體態度。只有基督教牧師烏布里希(Martin Ulbrich, 1863-1935)，根據自己在德國南部，為肢體殘障者成立療養院的實際管理過程，以及接觸眾多醫護人員的經驗，表示：

很奇怪，自殺或安樂死的支持者，都是從外行人的圈子中增加進來。但是照顧精神異常者的工作人員，反而是一致反對的，尤其是基督信仰的慈善團體代表們，他們所處理的，都是最悲慘的事情。⁷⁸

很可惜烏布里希並沒有為「一致反對」，提出可信的統計數據，或是更具說服力的說詞，以駁斥安樂死支持者的驚世論點。

⁷⁶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51. 同頁下方之註釋。

⁷⁷ Dr. Wauschkuhn,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217. 此處引自：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89.

⁷⁸ Martin Ulbrich, *Die Not der Anormalen und ihre Abwehr. Fingerzeige und Ratschläge aus 20jähriger Erfahrung* (Hamburg, 1923), 33. 此處引自：Jochen-Christoph Kaiser,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92.

五、結語

從《對於無生存價值生命滅絕的開放——其範圍與方式》出版後的回應文章來看，德國有關支持開放安樂死的論述，無論發表者的學術領域為何，均已呈現出將各類型不治之症患者集體看待、集體評價，而無視於病患的個別差異狀況；並且將人的生存價值經濟計量化，以人能否提供國家社會勞力或智力，判定生命的有用與無用；依此量尺，將不治之症患者集體歸類為浪費社會資源的多餘者。如此裁判與論述生命存廢之學者，不僅已接受「無生存價值者」此一尖銳的用詞，也已經認同以「滅絕」的方法處置生命。他們視安樂死為動機良善的措施，具有「解放、解救、解脫」不治之症生命的效用與道德功能，實行的終極目的乃在於使所謂「有用」的社會人群，得以擁有最佳生存資源，因此高度期待藉由國家公權力，賦予安樂死之實踐合法性與必要性。換言之，國家應該立法允許終結「無生存價值者」的生命。

「集體、多數」優先於「個體、少數」的想法，以及符合於「集體、多數」經濟效益的思考模式，明顯盤據在支持安樂死一方的論述中。依此而將佔人口少數的不治之症患者，視為「無用物」，貼上「無生存價值者」的標籤，這不僅完全漠視患者本身具有不可剝奪的生存權，也忽略每一位患者的病況差異、其親屬的態度，以及照護者與病患互動所可能產生的情感回饋。儘管有些論述以解決、解救無止境的病痛折磨為切入點，似乎思考動機良善，但是考察其論述的核心部分，仍然是抽離了人性、人文情感面，而僅僅為國家計算經濟成本、為社會節省人力、物力的統計數字考量。

由於安樂死課題本身具有高度的道德模糊與爭議性，例如：個人處理自身生命的自由權程度究竟有多大？另外安樂死也具有高度的法律論辯，例如：協助者是否有協助殺人的罪責？因此儘管 1920 年代的相關討論中，支持開放安樂死的意見，佔據絕大多數學術言論版面。但是直到威瑪共和結束，民主政府從未制訂任何允許安樂死合法執行的政策。1940 年代納粹政權執行了「T4 行動」、「小孩安樂死」與「14f13 特殊行動」等，強制性的集體安樂死。以納粹對於社會意見的嚴密控制與強勢主導，也深知安樂

死屬於極具爭議的敏感課題，為避免引起人民不安與反感，有可能導致政權不穩，因此將執行列為高度機密行為。但是上述數項行動的執行動機、主要方式與預期的結果，幾乎都脫胎自 1920 年代支持開放安樂死的論述內容：國家主導執行、經濟精算計量、重理性而非重人性的醫學判斷，以及「滅絕」社會無用之人。⁷⁹納粹藉由隱密執行，即不需公開討論細節，更可以迴避公開研議法律規範，也避免是否除罪化的道德爭議。這是威瑪共和時期支持安樂死人士，難以預料到的脫軌實踐。

德國自 1918 年首次脫離政治集權，進入與英、美、法同質性的民主時代。民主制度保障了開放、多元的論述空間。但是與西方民主傳統密不可分的「以人為本」、「人性至上」的理念，以及對於國家權力保持高度警覺的立場，在德國討論安樂死問題過程中，鮮見其發生影響力，反而對於「公權力介入生命終結」一事，寄予厚望。支持安樂死人士在思考上的諸多盲點、缺失與不周全，日後被極權政權運用，而將數萬人的生命推向無可逆轉的全然終止。二次大戰結束後，一位曾經在納粹時期擔任療養院院長的德國醫師供述，1940 年他在電車上遇見支持安樂死的先驅人物——霍賀：

他告訴我，他最近接獲一位親戚的骨灰……這位親戚被執行安樂死了。霍賀教授非常清楚的表達，他徹底反對當時的措施。他也詢問我，我如何護衛我的療養院。我告訴他，我盡最大的能力抵制。霍賀教授對此非常認同。⁸⁰

後人已無從得知，曾經熱切為支持安樂死寫下驚世論點的霍賀，在納粹時期立場翻轉的心路歷程。但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二次大戰後，西德審判納粹時期執行強制安樂死的醫師時，仍然有醫師堅稱，以安樂死處置不治之症的精神病患，不應視同犯罪，「同樣地，我認為對畸形胎兒 (Contergan-Kinder)，在出生之時即殺死他，是有必要的。」⁸¹甚至肯定「高

⁷⁹ 伍碧雯，〈納粹政權對於「無生存價值」德國人的處置〉，頁 299-304。

⁸⁰ 這是德國西南部艾門丁根 (Emmendingen) 療養院院長馬特斯 (Dr. Viktor Mathes) 於 1948 年的供述。此處引自：Ernst Klee, *»Euthanasie« im NS-Staat. Die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25.

⁸¹ Ernst Klee, *»Euthanasie« im NS-Staat. Die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3. 所謂 Contergan-Kinder 即指沙利度胺嬰兒，這是 1960 年代在西德發生孕婦吃藥後，產下畸形兒的醫藥界醜聞。

速公路、安樂死與種族衛生，是希特勒執行最好的三項成就」。⁸²威瑪共和時期積極呼籲政府開放安樂死人士，以解放悲慘生命與解決國家財政負擔為立論基礎點，其始終避談的執行失誤，在下一個世代，在極權政府的手中，卻已演變成道德失控與文明的野蠻性了！

⁸² Ernst Klee, »Euthanasie« im NS-Staat. Die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3.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論文與專書

- Barth, Fritz. *Euthanasie: das Problem d.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 Heidelberg: Hörning, 1926.
- Betz, Hans Dieter, Don S. Browing, Bernd Janowski and Eberhard Jüngel, Hg.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Handwörterbuch für Theologi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Bd. 2.,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9.
- Benzenhöfer, Udo. *Der gute Tod?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und Sterbehilf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9.
- Binding, Karl,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 Berlin: BWV • 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 2006.
- Eser, Albin, Hg. *Suizid und Euthanasie als human-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Problem*,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 1976.
- Fichtner, Gerhard. "Die Euthanasiediskussion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lbin Eser, Hg. *Suizid und Euthanasie als human-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Problem*,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 1976.
- Frewer, Andreas. "Die Euthanasie-Debatte in der Zeitschrift Ethik 1922-1938: Zur Anatomie des medizinethischen Diskurses", in Andreas Frewer, Clemens Eickhoff, Hg. *»Euthanasie« und die Aktuelle Sterbehilfe-Debatte. Die Historischen Hintergründe Medizinischer Ethik*,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Verlag, 2000.
- Frewer, Andreas, Clemens Eickhoff, Hg. *»Euthanasie« und die Aktuelle Sterbehilfe-Debatte. Die Historischen Hintergründe Medizinischer Ethik*,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Verlag, 2000.
- Grübler, Gerd, Hg. *Quellen zur deutschen Euthanasie-Diskussion 1895-1941*, Berlin: Lit Verlag, 2007.
- Jost, Adolf. *Das Recht auf den Tod*, Göttingen: 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895.
- Jütte, Robert. (in Verbindung mit Wolfgang U. Eckart, Hans-Walter Schmuhl und Winfried Süß) *Medizi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der*

- Forschung*, Göttingen: Wallenstein Verlag, 2011.
- Haeckel, Ernst. *Ewigkeit. Weltkriegsgedanken über Leben und Tod, Religion und Entwicklungsleben*,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Keimer, 1915.
- Kaiser, Jochen-Christoph, Kurt Nowak and Michael Schwartz, Hg.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Buchverlag Union, 1992.
- Kasper, Walter, Hg. *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Bd. 9., Freiburg: Herder, 2000.
- Klee, Ernst, Hg. *Dokumente zur »Euthanasie«*,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2001.
- Klee, Ernst. *»Euthanasie« im NS-Staat. Die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2004.
- Mann, Ernst. *Die Moral der Kraft*, Weimar: Biewald, 1920.
- Mann, Ernst. *Die Erlösung der Menschheit vom Elend*, Weimar: Fink, 1922.
- Merkel, Christian. *“Tod den Idioten”-Eugenik und Euthanasie in juristischer Rezeption vom Kaiserreich zur Hitlerzeit*, Berlin: Logos Verlag, 2006.
- Meltzer, Ewald. *Das Problem der Abkürz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Hall an der Saale, 1925.
- Mitscherlich, Alexander, Fred Mielke, Hg. *Medizin ohne Menschlichkeit. Dokumente des Nürnberger Ärzteprozesse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5.
- Nowak, Kurt. *“Euthanasie” und Sterilisierung im “Dritten Reich”: die Konfrontation der evangelischen und katholischen Kirche mit dem Gesetz zur Ver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 und der “Euthanasie”-Aktion*, Weimar: Böhlau, 1984.
- Nuland, Sherwin B. *How We Die: Reflections on Life's Final Chapter*,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4. 中譯本：許爾文·努蘭著，楊慕華譯，《死亡的臉》，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9。
- Zhong yi ben: Xuerwen Nulan, zhu, Yang Muhua, yi. *Si wang de lian*, Taipei: Shi bao wen hua chu ban gong si, 2009.
- Proctor, Robert N.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 Riha, Ortrun, Hg.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Beiträge des Symposiums über Karl Binding und Alfred Hoche am 2. Dezember 2004 in Leipzig*, Aachen: Shaker Verlag, 2005.
- Sandmann, Jürgen. *Der Bruch mit der humanitären Tradition. Die Biologisierung der Ethik bei Ernst Haeckel und anderen Darwinisten seiner Zeit*, Stuttgart: Gustav

- Fischer Verlag, 1990.
- Schmitz-Berning, Cornelia. *Vokabula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8.
- Schmuhl, Hans-Walter.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2.
- Ulbrich, Martin. *Die Not der Anormalen und ihre Abwehr. Fingerzeige und Ratschläge aus 20jähriger Erfahrung*, Hamburg, 1923.
- Weingart, Peter.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 Zimmermann, Volker. "Die »Heiligkeit des Lebens«- Geschichte der Euthanasie in Grundzügen," in Andreas Frewer, Clemens Eickhoff, Hg. »Euthanasie« und die Aktuelle Sterbehilfe-Debatte. *Die Historischen Hintergründe Medizinischer Ethik*,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Verlag, 2000.

(二) 期刊論文

- 伍碧雯，〈納粹政權對於「無生存價值」德國人的處置〉，《成大西洋史集刊》，第10期(臺南，2002)，頁287-310。
- Wu, Piwen. "Na cui zheng quan dui yu 'wu sheng cun jia zhi' de guo ren de chu zhi," *Cheng da xi yang shi ji kan*, di 10 qi (Tainan: 2002), 287-310.
- Brennecke, H. "Kritische Bemerkungen zu der Forderung Bindings und Hoches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Psychiatrisch-Neurologische Wochenschrift*, 23 (1921/1922), 4-9.
- Gaupp, Robert.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Deutsche Strafrechtszeitung*, H. 11/12 (7. 1920), 332-337.
- Hafner, Karl Heinz, Rolf Winau.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Eine Untersuchung zu der Schrift von Karl Binding und Alfred Hoche," *Medizinhistorisches Journal*, Bd. 9, Heft 3/4, (1974), 227-254.
- Schwartz, Michael. "„Euthanasie“-Debatten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6Jg. (1998), 617-665.
- Dr. Wauschkuhn.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Psychiatrisch-Neurologische Wochenschrift*, 24 (1922/1923), 215-217.

**The Pro-Euthanasia Arguments in the 1920s Germany - An
Analysis of the Book “*The Release of Destruction of Life Devoid
of Value: It’s Measure and It’s Form*”**

Wu, Pi-w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From the Ancient Greek period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euthanasia meant an easy or gentle death. It was also an ideal form of the end of life. Nevertheless, the English scholar Thomas Mo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Francis Bac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explained euthanasia with active thinking. Since then euthanasia meant ‘ending the Miserable Life’, which was wholly unlike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was contrary to the idea of ‘natural death’ from the tradition of the Christianity. In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issue of Euthanasia became a major topic among European scholars. After World War I Germany became a democratic state,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new liberal socio-political atmosphere encouraged many German scholars to talk about euthanasia broadly. Many of them were pro-euthanasia. The famous writing of pro-euthanasia, “*The Release of Destruction of Life Devoid of Value: Its Measure and Its Form*,” by Karl Binding, professor of law, and Alfred Hoche, professor of medicine, was published in 1920. 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essay examines how can we really resolve the ‘life unworthy of living’ in the society? It also shows that the vocabularies such as ‘life unworthy of living’, ‘idiot’ and etc., used by those German scholars, advocated a creative and active pro-euthanasia thinking, and brought the discussion of euthanasia in Germany to a high point.

What were the main points of the pro-euthanasia and how was it constructed to be a legitimate thinking? What was the blind spot in the pro-euthanasia

arguments? These question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research.

Keywords: Euthanasia,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1920s Germany, Karl Binding, Alfred Hoche, Life Unworthy of Living